

社會脈絡、個人網絡與臺灣 2004 年立法委員選舉 選民的投票抉擇*

張佑宗、趙珮如

國立臺灣大學

摘要

本文研究結果發現，在控制選民政黨認同的條件下，認同泛藍陣營的選民，如個人與家庭其他人的政治立場不一樣，比起那些家庭內成員的政治立場一樣，或是家庭內成員的政治立場都不一樣的人，最後把票投給泛藍陣營的比率最低（69.6%）。在家庭成員的壓力下，他們也沒把票投給泛綠陣營，而是有部份的人選擇不去投票（26.1%）。認同泛綠陣營的選民，如個人與家庭其他人的政治立場不一致，比起那些家庭內成員的政治立場一致，或是家庭內成員的政治立場都不一致的人，最後把票投給泛綠陣營的比率也是最低（47.1%）。在家庭成員的壓力下，他們也沒把票投給泛藍陣營，而是有高達 47.1% 的人選擇不去投票。透過 Logistic 迴歸模型的分析，政黨認同仍是影響選民投票抉擇最重要的因素，不管是泛藍或泛綠的認同者，居住在其支持陣營較弱勢的地區，最後投給其所認同陣營的比率高於同樣認同其陣營，但居住在其陣營得票率較高的村里。在控制地理區域下，政黨認同仍是影響選民投票抉擇最重要的因素，居住在北部的選民，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泛藍陣營；年紀越低，越支持泛綠陣營。

關鍵詞：社會脈絡、個人網絡、2004年立委選舉、投票抉擇

張佑宗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專長領域包括比較民主化、選舉研究、東亞政經發展與拉美研究。

趙珮如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所碩士生，研究領域為選舉研究。

* 本文初稿發表於由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辦之「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5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經驗調查之跨國比較」，2005/11/12-13。作者感謝莊文忠助理教授的評論，以及陳陸輝副研究員提供的意見。另外，也要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細心的指正與修改建議。

（收件：2006/3/17，修正：2006/4/7，接受：2006/5/9）

壹、前言

隨著現代科技與統計方法的發展，民意調查已經成為建構經驗政治理論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其中受惠最多的，就是投票行為理論的發展。當今主流的投票行為理論，認為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因素，主要是個人的政治心理態度因素，完全不受社會因素或其所處的環境脈絡所影響。例如「密西根學派」（Michigan School）從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途徑（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分析個人的政治認知、政治態度、政黨認同（或群體認同）與政治興趣，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另外一個與「密西根學派」分庭抗禮的理性選擇研究途徑（rational choice approach），則從選民個人利益考量的角度，分析選舉議題與立場，或是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上述兩種投票行為研究主要的研究途徑，基本假定個人如原子般地行動，社會規範、網絡與制度對其投票抉擇一點也沒制約力，這種「低度的社會性」（undersocialized）的假設，以及總體環境脈絡因素，近年來逐漸受到各種挑戰（Curtice, 2002; Erikson, 2002; Johnston and Brady, 2002; Marsh, 2002; Stoker and Bowers, 2002）。

然而，早在「密西根學派」與「理性選擇途徑」出現之前，Lazarsfeld, Berelson 與 Gaud（1968）提倡社會學的研究途徑，他們認為選民的媒體使用、社會脈絡與個人政治討論的網絡，對其投票抉擇有重要的影響，一般人稱他們為「哥倫比亞學派」（Columbia School）。晚近，社會學的研究途徑逐漸又獲得重視，因為選民雖具有主觀的偏好與意志，但絕不是如原子般孤立的行動個體，任何投票抉擇的形成、強化或改變，都是為了回應其所處的社會與政治環境（Finifter, 1974; Huckfeldt and Sprague, 1987; Huckfeldt et al., 1998; Shanon, 1990）。因為絕大部分的人類都生活在家庭、朋友、同事和鄰居等所共同組成的社會關係網絡中，並且被各種由脈絡因素所提供的資訊媒介包覆。因此，個人投票的抉擇，多少會受到他人的意見，或是社會情境的刺激，最後影響其投票抉擇。

目前國內有關社會脈絡、個人網絡與選民投票抉擇因果關係的研究，尚未受到普遍的重視。然而，這並不代表臺灣社會缺乏社會取向投票的選民。尤其是臺灣區域立法委員的選舉，雖然屬全國性的選舉，但往往缺乏全國性的競選議題；加上採用單一席次不可讓渡制（Single Non-Transfer Vote, SNTV），造成同黨候選人之間相互競爭，努力凸顯自己與同黨候選人間的差異，而不是凸顯自己與另一個政黨間的差異；即使現任立法委員在立法院有優異的表現，並不足以保證下次選舉時同樣能當選。以上這些因素，都足以讓我們重新思考使用傳統的政黨認同、議題取向與候選人評價等三個因素，是否足以解釋臺灣選民在立委選舉中的投票行為。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補充臺灣主流的選舉研究，將利用在臺灣蒐集到的總體資料（分別是 2004 年立委選舉各村里投開票資料與地理區域），結合 TEDS 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所提供的個體調查資料（包括個人政治討論網絡、政黨認同、統獨立場，以及基本經社背景資料），試圖初步探索臺灣選民投票行為的背後，是否受到社會脈絡，或是個人政治討論網絡的影響：選民居住區域的特性，例如各政黨不同的勢力版圖，或是地理區域（北、中、南）上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其投票抉擇？選民的家庭成員、鄰居、朋友與同事的政治立場，是否會影響其在臺灣 2004 年立委選舉上的投票抉擇？

本文以下分為六大部分，第一部份將回顧投票行為研究中，社會取向的研究途徑，並試圖說明這個研究途徑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第二部份將簡介國內與本文所採取類似的研究途徑與其主要的研究成果；第三部份將說明如何測量本文所提出的社會脈絡與個人政治討論網絡這兩個概念，並詳細列出測量的題組；第四部份將說明個人政治討論網絡，對臺灣選民投票抉擇有明顯的影響，尤其是家庭的政治討論網絡；第五部份將分析選民所處不同的政治版圖、地理區域，對其投票抉擇的差異，雖然政黨認同仍是最重要的解釋因素，但不同的個人網絡，尤其是家人的政黨立場仍有其影響力；最後一部份則是本文的結論。

貳、社會取向的研究途徑

自從 1960 年代之後，只有極少數人從社會取向的角度切入選舉的研究。這種現象到了 1980 年代末漸漸有了轉變，許多人重新主張選舉研究應該再回到社會脈絡、個人討論網絡與媒體使用等因素上（Huckfeldt and Sprague, 1987）。光從選民心理取向出發已經不足夠解釋選民的投票決定，必須要結合社會整體特質與個人心理取向的研究，才能建立更周延的研究理論與架構，也才能更完整解釋影響選民投票選擇的結果。

過去，「哥倫比亞學派」強調人際溝通，尤其是初級團體、意見領袖對個人偏好的影響。同時，他們也強調社會網絡以及大眾傳播媒體對選民投票抉擇的重要性（Berelson, Lazarsfeld, and McPhee, 1954）。Key 與 Munger（1959）兩人觀察 1868 年、1900 年、1920 年、1948 年四次的美國選舉，發現有許多相似之處。一般來說，大部分州的農民幾乎支持共和黨，城市居民則支持民主黨。然而，在印第安那州的農業社區，幾乎都投票給民主黨。他們認為這些異常的投票行為，和其區域的歷史有關。有些郡受到南北戰爭的影響，有些則是基於種族與宗教上的因素。這些研究發現顯示區域的歷史和社會脈絡，是解釋投票行為不可忽視的一部份。

Finifter（1974）觀察 1961 年美國的總統大選，調查一家汽車公司內各個工作小組（workshop）成員，對民主黨或共和黨候選人支持傾向的差異，用來檢驗團體對個人投票抉擇的影響力。由於這家公司的工會是支持民主黨，並參與協助募款及競選工作，再加上當地報紙也傾向支持民主黨的候選人，因此在大環境脈絡下，這些工作小組被認為是民主黨的附屬團體。然而，經過資料的檢証後，發現當親密的關係增加時，支持共和黨的比例跟著增加，支持民主黨的比例反而降低。這是因為在這些工作小組內，支持共和黨的人居於少數，在大環境中成為政治的異議者，迫使其鮮少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但是為了降低認知的不一致，增加社會的支持，以及評價自己的需要，他們會在工作小組內

尋找朋友，建立起更親密與鞏固的關係。因此，當外在的相反意見愈強，異議者之間的整合也愈強。也就是說異議者比起支持民主黨的人，更急於尋找與其態度相近的異議者結交朋友。這樣的行動邏輯，Finifter 認為同樣適用於種族、宗教、社會階級，以及工會成員等議題中。

Monroe (1975) 認為社會因素會影響個人的意見，是因為人對於週遭環境事物都會有一種知覺，並根據自己的知覺作出反應，這類的知覺通常是自我主觀的認定，但不同的環境會影響個人的知覺，並且在不斷互動的過程中形成相同之意見。而團體的認同愈深，愈容易產生一致性的行動與態度。因此，個人的意見除受到主觀認知的影響外，環境脈絡與團體的限制和制約也很重要。Huckfeldt 與 Sprague (1987) 指出，政治是包含在社會互動結構模型中的一種社會活動，其中政治資訊不只是透過個人傳遞，社會網絡也同時透過各式各樣的社會機制，這樣的政治資訊不僅藉由單一個體加工與整合，也需要透過社會結構來傳遞、接收、詮釋政治資訊。因此，政治行為可以從個人以及所屬的團體、網絡或其他社會組成來理解。兩位作者在 1984 年針對南灣地區進行調查研究，他們以社區總體資料當成脈絡因素，並以受訪者和其所告知的政治討論者，測量人際網絡的討論。研究結果發現選民察覺與其相似投票傾向的討論者的投票行為，如屬於社區少數的一群，他們在知覺多數者的偏好上，有較高的準確度。其次，個人會有意建構和其政治偏好相同的資訊網絡，會淘汰若干他們認定是錯誤的政治資訊。第三，個體層次的溝通過程，會受到社會脈絡的影響。脈絡提供機會與限制，個人對政治資訊的控制僅是部份而且不完整。最後，資訊在社會脈絡的互動過程中，比較有利於政治多數者，不利於政治少數者，在不一致關係中，屬於少數的選民會承認與週遭環境偏好上有所不同，但屬多數的選民則容易忽略不一致的資訊。

1990 年代以後投票行為研究逐漸產生轉變，逐漸將過去注重選民個人政治心理的因素，轉變到選民抉擇時資訊所扮演的角色，資訊的質與量將會影響選民如何抉擇 (Bartels, 1988; Popkin, 1991; Westlye, 1991)。Flanagan (1991)

© 2006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的研究證實，日本社會網絡的影響力是透過候選人、工作場所、意見領袖來傳達，具有促進選民投票、轉化選民政治傾向、建立政治態度等作用。Huckfeldt, Plutzer 與 Sprague（1993）三人認為社會互動已成為政治資訊與規範傳遞的媒介，政治偏好是互相依賴的選民，在脈絡中做成的決定和選擇，不只具有選民個人的特性，也結合了周遭其他種種社會脈絡的特徵。然而，要去定義社會脈絡及其範圍是很複雜的，三位作者因而採用自我中心的社會結構定義，每一個個人在其所處的生活空間中，都是獨特的，由個人自行報告其社會關係，以建構社會網絡的指標，包括親密關係與程度、互動頻率、政治的目的是否明確、政治內容與社會互動等。這種研究方式會降低社會結構而顯現個人抉擇的風險。但作者認為，所謂的社會控制，也不全然代表個人無法有其意見的表達，只是限制了其互動的範圍、機會與提供脈絡性的選擇。三位作者研究南灣地區居民生活在社區及教堂兩個社會脈絡下，對墮胎政策的偏好程度，以及政黨認同這兩種政治態度的影響，並關注政治資訊在提供者與接收者之間流動的過程。研究結果發現，最支持共和黨的人，是處於共和黨的教區及社區，最支持民主黨者，則是處於民主黨的教區、共和黨的社區。這樣的結果不能直接解釋「交叉壓力」（cross-pressure）的觀點。雖然在共和黨脈絡一致的地區，的確加強了對共和黨的忠誠，但在民主黨脈絡一致的地區，結果卻不是這樣。在教區與社區交叉以及重疊下，不一致與不對稱就產生了，由此可見教區提供了社區中個人一種庇護所。另外，三位作者也發現對墮胎議題的態度上，教區的重要性也大於社區，而且天主教徒的政黨認同，與兩個脈絡都有強烈相關，因此他們較少發出不一致的政治訊息，而非天主教徒則是相反。可見社會脈絡對於政治的確有影響，但須視社會結構當中的不同因素而定，同時也與個人的社會經驗有關。

Rahn, Aldrich 與 Borgida（1994）三人研究選民如何對候選人進行評價，他們認為近年來投票抉擇的研究，逐漸將焦點放在選民抉擇時資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選民的資訊處理方式。如果選民評價候選人，是從獲取資訊的那一刻

開始，這個判斷就是屬於「線上模式」(on-line model)。當選民接收新資訊時就會不斷更新此判斷。而「記憶模式」(memory-based model)並沒有建構一個不停紀錄的計時器，選民只是從記憶中抓取片段資訊，但尚未得到一個整體的評價。因此，特定的資訊和候選人評價之間存有一定關係，選民的動機和認知能力，也會影響選民在判斷時要使用那一種模式，個人必須要有適當的能力，也就是政治練達度高的人才能使用線上模式。而選民所處的資訊脈絡也會影響選民在處理資訊時所選擇的模式。三位作者透過設計虛構的候選人和操縱的資訊結構，模擬一場州議員的政治競選活動，觀察脈絡因素在候選人評價過程中的角色。研究發現政治練達度本身，並不會影響記憶和判斷，但是練達度高者，資訊結構對他們的影響有限。練達度低者，在個人中心(person-centered)的情境下可以使用線上模式處理資訊，但在面向中心(dimension-centered)的情形下，使用記憶模式的強度會提高，也就是說資訊脈絡的確影響選民的抉擇，尤其對資訊結構敏感的人來說影響更大。

Huckfeldt, Levine, Morgan 與 Sprague (1998) 則檢驗競選期間人民的政治偏好相互「溝通」的過程。他們除了關心個人在面對關係網絡做出判斷的能力，還包括回應的時間，以分析受訪者是否知覺、親近性(accessibility) 討論者的偏好與受到的影響。唯有放入親近性，才能使我們不只討論訊息、傳送與接收訊息者，還能深入分析溝通的過程。作者藉由印第安納大學調查研究中心，在 1996 年總統大選時所收集的調查資料，結果發現受訪者對討論者政治偏好的知覺與親近性，主要依賴個人和脈絡的因素。

Mutz (2002) 認為傳統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對投票行為的研究，非常注重「交叉壓力」對個人投票決定影響的問題。在 Lazarsfeld, Berelson 與 Gaudet (1968) 的《人民的抉擇》(*The People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一書中，認為衝突和不一致會影響個人的投票決定或延遲投票決定，並降低選民在選舉初期的參與。Campbell et al. (1960) 在《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 一書中，也有相同論點。早

期對「交叉壓力」的研究，主要認為衝突是發生在社會成員間的特徵，例如宗教信仰與種族，近來有許多的研究則包括了個人的政治網絡特性。Mutz 爲了避免與「交叉壓力」混淆，使用「重疊網絡」（cross-cutting networks）一詞，他認為「重疊網絡」可以用兩個社會心理機制或面向來解釋。第一是政治的模擬兩可（political ambivalence），第二是社會責任（social accountability）。前者指涉人際間的衝突，如果選民處於與自己不同觀點的網絡中，會影響其政治態度，使其立場不確定，最後比較不可能採取政治行動，不過此種情形並不同於無立場或是中立者。後者則指選民對於社會安定有一種責任感，爲了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發生，而妨害了其政治參與。作者藉由威斯康辛大學調查中心，針對1996年美國總統大選所做的調查資料進行分析，並採取滾雪球（snow-ball）的抽樣方式，追蹤與受訪者最常討論重要的事，或政治事物的討論者，以及其討論的頻率，再利用 CNEP（Cross National Elections Project）針對1992年大選的統計資料分析，證實選民處於衝突的網絡中，尤其是與人面對面的情形下，雖然會理性看待反對意見並鼓勵容忍的態度，但爲了避免拿其社會關係冒險，會限制本身的政治參與或延遲政治的決定。而處於相同網絡之下時，則會更加強原先的觀點。當然，選民也會傾向建構相同脈絡的環境，以減少不一致的衝突。可見在「重疊網絡」的接觸中，人際衝突與社會責任因素，同樣對投票行爲具有顯著影響。

最後，Beck et al.（2002）嘗試整合資訊媒介（information intermediaries）與個人或社會網絡的探討。脈絡因素之所以重要，即在於資訊來源本身帶有偏差性。當選民依賴某一資訊來源時，很可能促成選民做出有利於一方，而不利於另一方的抉擇。最佳的情形是選民全面地收集相關的資訊，最後再做出抉擇，但是資訊成本的存在，以及選民本身能力的限制，都說明了選民僅能收集有限的資訊。Beck et al.（2002）在該研究中區分政治資訊的來源，包括人際討論、閱讀報紙或雜誌、收看電視新聞或參與政黨活動。因此研究對象就包括報紙、政黨活動、競選活動，以及用面訪的方式瞭解受訪者人際互動的情形。該

研究結果顯示，人際溝通網絡、媒體偏差及政黨及組織偏差對投票抉擇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進一步探討則發現，人際互動、報紙社論和次級團體組織對投票抉擇的影響很顯著。而電視報導、報紙報導和政黨活動都沒有顯著的影響。析論前三者影響力可能的原因有二：一為訊息的清晰度和人際信任，另一個為次級組織或報紙社論，已經對候選人做過仔細的評價。至於後三者的影響不顯著，則是報紙和電視都是屬於雙元訊息的溝通模式，因此對候選人的報導多是以持平立場處理居多。^① 整體而言，他們發現社會脈絡對投票抉擇的影響，以人際網絡及組織的影響力最強；其次，黨派意識也直接影響投票抉擇；報紙社論所帶有的黨派偏差對投票抉擇有直接的影響，但一般報紙和電視報導則不具影響力。總結來說，相對於媒體，組織和人際網絡傳遞內容較多的黨派訊息。因此社會媒介的傳播偏差對 1992 年柯林頓的勝選扮演關鍵的影響。

參、國內相關的研究

過去國內採取社會學取向的研究途徑，主要是從媒體作為資訊提供者的角度進行觀察，但是並沒有從選民（需求者）主動選擇資訊的觀點進行觀察。特別是人際溝通的討論，以及分析選民如何受到周圍環境脈絡因素的影響，以及受其影響的程度。

例如政治傳播學者從選民訊息接收與政治信任、政治行為的關連，特別是媒體對於選民資訊來源壟斷的觀點進行觀察（郭及天、王嵩音，2001；彭芸，2001, 2002；張卿卿，2002）。陳文俊（1995）分析選民投不投票的原因，投票的抉擇與大眾傳播媒體使用的關係等，結果發現除了大眾傳播媒體的資訊外，選民很少有其他選舉參與的方式。黃秀端（1995）研究 1994 年省長選舉時，將投票和競選活動分開，她認為閱讀候選人的傳單或是觀看選舉新聞，比較傾

^① Zaller（1992）區辨出「單一訊息」（one message）及「雙元訊息」（two message）兩種不同的政治溝通模式，前者大都帶來共識結果，後者則是帶來更多的辯論。

向選舉資訊的接觸，不算是真正參與競選行為。但在選舉期間，選民收聽地下電臺，以及參與候選人的競選活動最為普遍。

彭芸（2001）研究臺灣 2000 年總統大選時選民媒體使用的情形，以及對選民的政治效能、政治參與的影響，特別是了解傳統大眾傳播媒體的使用與新興媒介的比較，例如 call in 節目，以及網際網路的使用對選舉參與的影響。作者在選後不到一週的時間，利用電話抽樣調查涵蓋全國（包括臺灣本島及澎湖）20 歲以上的合格選民進行訪問，結果發現選民的選舉參與程度比過去的選舉要來的高，印證在選情激烈且勝負不明的情形下，民眾參與競選活動的比例較高。其次，媒體的使用也較為積極，經常看無線臺選舉新聞的有四成，經常收看有線電視臺選舉新聞的有五成，而注意報紙選舉新聞的也佔六成以上，這都顯示選民對選舉新聞非常注意，至於聽廣播與 call in 節目、上網的人數則偏少。不過，報紙、電視等選舉新聞的使用，並不能明顯解釋其政治參與，反而是收看 call in 節目與電視政見會具有顯著的影響。

翁秀琪、孫秀蕙（1994）觀察選民媒介使用的行為及其政治知識、政黨偏好與投票行為研究的關係。她們的研究結果顯示，選民的政治知識會影響其閱報與收看電視，至於閱讀不同報紙和收看不同電視新聞者，其政治知識就沒有差異。閱讀不同類型的報紙，和收看不同類型的電視新聞，會影響其政黨偏好和其政黨投票選擇，證明媒體使用情形確實存有市場壟斷的問題，並且影響選民的政治態度與政黨偏好。孫秀蕙（1995）則是比較選民使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對其政治行為的差異。傳統媒體是指報紙媒體、三台新聞；新媒體是指第四台新聞和收聽地下電台、Call-in 節目、網路上電子布告欄（BBS）。研究結果顯示，新媒體的使用仍不普及，但是使用新媒體的選民投票行為，和未曾使用過新媒體的選民存有顯著差異，1994 年省長的選舉，使用新的無線電視台的選民，比較傾向支持民進黨。另外針對臺灣 1996 年的總統選舉，孫秀蕙發現支持李登輝的選民，多屬於不知不覺者（chronic know-nothings），也就是媒體使用率偏低、政治知識不足，並對選舉議題不感興趣的人（孫秀蕙，1996）。

關於環境脈絡與選民投票行為之間的關係，洪永泰（2000）提出政治版圖的概念，作者假定在於某地區長期以來民進黨獲得穩定的得票率，代表民進黨在此地區受到某種程度的穩定支持，如此才會產生穩定的得票率，其分析方法主要是整合選區內歷次選舉投票所的地理範圍及投票紀錄，挑選政治指標（例如政黨或地方派系），將投票所依其指標進行分群，每一種集群結果都加以變異數分析，再進行區辨函數判讀法，讓電腦重新判別每一單位所屬的集群，以錯判率最低者為最好，政治版圖即告確定。徐永明（2001）回應政治版圖理論，他認為某地區民進黨有穩定的得票率，雖然有可能在歷次選舉都為同一群支持民進黨的選民，但也有可能是不同選民，卻剛好形成穩定的得票率，因此政治版圖僅能夠解釋政黨在該地區歷年來，所獲得的支持與變動情形，無法因而推估選民支持的流動情形。他提出忠誠選民的解釋，^② 補充洪永泰政治版圖假定的未竟之處。其研究結果發現各群集中，忠誠選民的比例並無太大差異，顯示由得票率高低所劃分的群集，對忠誠選民而言並沒有太大影響，反而發現選舉年份（制度因素）對忠誠選民才是具有影響力的因素。另外，徐永明也發現除了民進黨在南方地區有較高得票率之外，南部選民在投票本質上也傾向穩定，形成所謂「南方政治」的一大特色（徐永明，2000）。

吳重禮、譚寅寅、李世宏（2003）認為不宜純然由行政區域或地理環境著眼，而應該深究某些地區是否具備特殊的政治特性，而影響選民的政治態度與投票行為，因而提出「賦權理論」為探討的基礎。「賦權理論」強調當某些弱勢團體精英取得若干政治公職之後，且掌握政治權力的時間愈久，對政治決策過程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進而激發所屬團體成員政治態度，積極參與政治事務。賦權理論強調由上而下的過程，並藉由政治精英取得政治職位，得以在短期內改善弱勢團體的政治地位。

蔡明惠（2004）則針對澎湖地區的外省籍榮民，依照選舉層級的劃分，探

^② 即在上一次選舉投票給某政黨，在下次又投票給該政黨的選民比例。

究其投票取向的差異性，並討論族群政治在澎湖地區應有的理論內涵。結果發現，愈是地方性質的選舉，以社會關係取向為投票依據的選民愈多，尤其「居住地區」與「縣議員選舉投票支持取向」更有顯著關聯，住在眷村地區的外省籍榮民以政黨取向投票為多，而居住在非眷村地區的外省籍榮民比住在眷村地區的外省籍榮民具有較高比例社會關係的投票取向，可見眷村藩籬的拆除，有助於解構分隔產生的誤解，加強鄰里與族群之間的互動。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國內近年來已開始重視社會脈絡、總體環境與投票抉擇的關係，但幾乎沒有人討論到個人政治討論網絡所產生的影響。因此，本文以下分別針對個人政治討論網絡、社會脈絡這兩大因素，看其對臺灣 2004 年立法委員選舉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

肆、社會脈絡與個人政治討論網絡

選舉是一種社會活動，鑲嵌於社會互動的結構模式中。選舉資訊不僅靠媒體傳遞，也受到非正式的社會機制所影響，如街頭巷尾的政治談論、T恤上的競選標語等。選舉資訊的流動不僅可以在單獨的個人身上看見，也可以在人們彼此相互連結的團體中觀察。因此政治行為必須在網絡、團體或其他社會建構等「相互連結的個人」中觀察，這些社會建構將決定政治資訊交換的機會。人們不論交友或交談的內容，往往受限於環境，但人們常把外在環境因素當成理所當然。因此，Huckfeldt 與 Sprague（1987）主張從「個人決定討論對象及內容」和「社會建構提供的朋友及交談內容」兩個面向觀察，研究人們如何詮釋政治資訊，以及社會脈絡如何影響資訊的交換。政治資訊經由社會互動的過程所傳遞，個人的政治偏好會決定所接收的政治資訊；另一方面，社會資訊也會決定個人的政治偏好。政治偏好端賴社會所提供的資訊，具有動態性和回應性。選民所處的地方將使選民曝露於特定的社會脈絡，並造成選民接觸政治資訊的偏差。社會脈絡提供社會互動的機會，因此個人選擇討論對象和討論內

容，都將受到社會脈絡所提供的機會或限制所影響。

社會脈絡 (context) 和個人政治討論的網絡 (network) 同時存在於個人身上，兩者的差別在於，脈絡是強加於個人身上的建構，而網絡是個人主動建構的。脈絡是外在於個人而存在，可能是一種制度性的結構，也可能是個人運作其間的社會安排 (Johnston, Shively, and Stein, 2002)。在選舉研究中通常指受訪者所處的地域環境 (localities)，因為許多的政治活動都是以地區為基礎的互動。不過，Marsh (2002) 指出「選區」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其效力甚至會影響到各區域。因此，在研究中要設法定義脈絡的主要參數，以及確保該參數與依變項之相關性。網絡則是由個人自願性所建構的互動範圍，是個人自主決定，為選擇下的產物，但是仍受到社會脈絡所提供的機會與限制的影響。Shanon (1990) 認為行為包含行動者與其環境，人們不論交友或交談的內容，往往受限於環境，但人們常把外在環境因素當成理所當然。Huckfeldt 與 Sprague (1987) 兩人指出許多的政治參與和行動，是經社會環境的刺激而來。然而，社會網絡的影響力還須與個人屬性配合，他們主張從「個人決定討論對象及內容」和「社會建構提供的朋友及交談內容」兩個面向觀察，研究人們如何詮釋政治資訊，以及社會脈絡如何影響資訊的交換。

政治資訊經由社會互動的過程所傳遞，個人的政治偏好會決定所接收的政治資訊；另一方面，社會資訊也會決定個人的政治偏好。以下三個重要的原因可能使得個人對資訊的控制力上升；相對地，社會脈絡對政治資訊的提供功能將被削弱。第一，個人可以選擇討論政治的對象；第二，討論對象可能重新詮釋產生不協調的資訊；第三，討論對象可能刻意地隱瞞自己真正的意見。Berry 與 Lewis-Beck (1986) 指出，利益不可以直接轉換成個人偏好，因為偏好必須先被瞭解，而資訊是透過社會建構的管道所傳遞。McPhee (1963) 也提出個人的政治偏好是在特定的社會建構中下維持的，藉著人際互動而成形。

政治偏好有賴社會所提供的資訊，具有動態性和回應性。選民所處的地方將使選民曝露於特定的社會脈絡，並造成選民接觸政治資訊的偏差。社會脈絡

提供社會互動的機會，因此個人選擇討論對象和討論內容，都將受到社會脈絡所提供的機會或限制所影響。例如，在高級住宅區遇到共和黨員的機率比遇到民主黨員的機率高。Finifter（1974）研究指出共和黨員的工人在社交活動上比較內向，因為他們不想和人數上占優勢的民主黨員接觸。Berger（1960）從事勞動階級的社交活動研究，也顯示中產階級流動在社區生活中消失。兩者皆反應個人社交活動選擇回應所處的社會脈絡。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社會脈絡的產生，也決定於個人各種考量之下的結果。Johnston, Shively 與 Stein（2002）就提醒我們，總體變項的選擇，要排除虛假的脈絡資訊，以避免研究的誤差。

蔡勇美、郭文雄（1984）則認為當我們分析個人社會脈絡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時，須將個人網絡的性質一起考慮。Pahl（1988）也提出網絡的密度、集中度、同質性程度，以及利用網絡連帶尋求支持所付出的成本代價，與集體行動的產出效果有關。由此可知，網絡的大小性質也深深影響其與選民之間的連結性，政治資訊在傳遞的過程會因為網絡不同的性質效應，進而影響選民對訊息接收的感知以及其投票抉擇。

如何測量社會脈絡因素與個人政治討論網絡因素？受限於資料取得的因素，在社會脈絡部份，本文主要分析選民所處的環境脈絡，包括政治版圖（泛藍陣營得票超過 60% 的區域、50-59% 的區域，以及不到 50% 的區域）與居住的地理區域（北部和花東地區、中部與南部），對其投票抉擇的影響。在個人政治討論網絡部份，本文資料使用「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5 年 1 月中旬到 3 月中旬，針對立委選舉面訪所得資料（A 卷），總計成功樣本 1,252 份。之所以使用該筆資料來做分析，主要原因為該問卷設計係採取 CNEP（Comparative National Election Projects）的架構，比以往問卷有較多關於選民社會接觸的背景問題可供參考。加上立委選舉不如總統選舉時那麼強調意識形態立場，反而和地緣、人緣關係密切，因此社會關係取向的投票行為容易顯現。然而，受限於本文援引的民意調查資料並非採用滾雪球的抽樣方式（snow ball sampling），因而無法得知討論者（discussants）真實的偏好與傾向，也無

從驗證受訪者對網絡資訊知覺的正確性，僅能利用現有的資訊進行分析。另外，對於態度親近性的測量，也由於缺乏回應時間的設計，而改以問卷當中相關的題目來取代。

在測量人際討論網絡部份，問卷中詢問選民會不會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有關候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以及他們的政黨支持等，詳細問卷的題目如下：

H1A：請問您會不會與家人討論有關候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論、有時討論、很少討論，還是從來不討論？

H1B：那您與您的家人支持的政黨是不是相同？

H2A：請問您會不會與朋友討論有關候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論、有時討論、很少討論，還是從來不討論？

H2B：那您與您的朋友支持的政黨是不是相同？

H3A：請問您會不會與鄰居討論有關候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論、有時討論、很少討論，還是從來不討論？

H3B：那您與您的鄰居支持的政黨是不是相同？

H4A：請問您會不會與同事討論有關候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論、有時討論、很少討論，還是從來不討論？

H4B：那您與您的同事支持的政黨是不是相同？

伍、個人政治討論網絡的頻率、密度與方向

就個人政治討論網絡的頻率而言，主要有四種類型：時常討論、有時討論、很少討論與從不討論。表一中可以看出，人際之間的討論仍是以家人最多，超過六成七，顯示家人仍是主要接觸討論的對象，其次是朋友的六成三，第三的是同事，約有四成二，和鄰居討論政治議題最低，只有二成五。

表一 人際討論的頻率

	時常討論		有時討論		很少討論		從不討論	
	%	n	%	n	%	n	%	n
家人	7.1	88	29.9	371	30.2	375	328	407
朋友	4.4	55	29.1	363	29.6	370	36.9	461
鄰居	1.0	12	8.7	108	16.3	204	74.0	924
同事	4.4	44	23.0	233	24.7	250	47.9	484
N=1252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5）。

再就個人政治討論網絡的頻率，與地理區域或都市化差異之間的關連，透過交叉分析（contingency tables）可以得知，表二顯示在家人的部份，居住地越偏向北部地區，或是居住地都市化層級越高的地區，與家人討論政治的頻率就越高；反之，居住地越偏向南部地區，或是居住地都市化層級越低的地區，與家人討論政治的頻率就越低。在朋友的部份，居住地越偏向北部地區，與家人討論政治的頻率就越高，至於居住地的都市化程度則對政治討論的頻率沒有影響。在鄰居部份，不論其居住地的地理區域或都市化程度，都對其政治討論的頻率沒有任何的影響。在同事部份，居住地越偏向北部地區，或是居住地都市化層級越高的地區，與家人討論政治的頻率就越高；反之，居住地越偏向南部地區，或是居住地都市化層級越低的地區，與家人討論政治的頻率就越低。

其次，就個人政治討論的密度來看，如累計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有討論候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等，最後得到一個從 0 到 4 指數，最低分「0」表示都沒有和人討論，最高分「4」表示都有和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候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等。表三顯示，從沒有和別人討論政治的約二成三，只與一種類型的人討論的約有一成五，和二種類型的人討論的約有二成，和三種類型的人討論的約有二成九，和四種類型的人討論的約有一成五。整體來看，分佈還算平均。

表二 地理區域、都市化程度與個人政治討論網絡頻率的交叉分析

家人				時常討論	有時討論	很少討論	從不討論	樣本數	檢定	
	地理區域	北	n	52	196	184	189	621	$\chi^2 = 26.265$ $p < .001$	
			%	8.40	31.60	29.60	30.40	100		
		中	n	12	81	65	54	212		
			%	5.70	38.20	30.70	25.50	100		
		南	n	24	94	126	164	408		
			%	5.90	23	30.90	40.20	100		
	N			88	371	375	407	1241		
	都市化程度	鄉	n	11	71	88	108	278		$\chi^2 = 19.415$ $p < 0.05$
			%	4	25.50	31.70	38.80	100		
鎮		n	20	80	74	89	263			
		%	7.60	30.40	28.10	33.80	100			
市 (含縣轄市)		n	39	134	145	152	470			
		%	8.30	28.50	30.90	32.30	100			
直轄市		n	18	86	68	58	230			
		%	7.80	37.40	29.60	25.2	100			
N			88	371	375	407	1241			
朋友	地理區域	北	n	189	29	187	188	626	$\chi^2 = 26.265$ $p < .001$	
			%	30.40	4.60	29.90	30	100		
		中	n	54	9	78	71	212		
			%	25.50	4.20	36.80	33.50	100		
		南	n	164	17	98	111	411		
			%	20.20	4.10	23.80	27	100		
	N			407	55	363	370	1249		
	都市化程度	鄉	n	11	67	78	124	280	$\chi^2 = 12.963$ $p = .124$	
			%	3.90	23.90	27.90	44.30	100		
		鎮	n	17	81	76	89	263		
			%	6.50	30.80	28.90	33.80	100		
		市 (含縣轄市)	n	19	146	144	162	471		
			%	4	31	30.60	34.40	100		
		直轄市	n	8	69	72	86	235		
			%	3.40	29.40	30.60	36.60	100		
	N			55	363	370	461	1249		

續表二

鄰居	地理區域	北	n	3	52	101	471	627	$\chi^2 = 9.752$ $p = .136$
			%	0.50	8.30	16.10	71.10	100	
		中	n	2	20	45	144	211	
			%	0.90	9.50	21.30	68.20	100	
		南	n	7	36	58	309	410	
			%	1.70	8.80	14.10	75.40	100	
		N			12	108	204	924	
								1248	
	都市化程度	鄉	n	3	30	47	199	279	$\chi^2 = 6.489$ $p = .690$
			%	1.10	10.80	16.80	71.30	100	
		鎮	n	3	26	43	190	262	
			%	1.10	9.90	16.40	72.50	100	
		市 (含縣轄市)	n	4	35	83	350	472	
			%	0.80	7.40	17.60	74.20	100	
		直轄市	n	2	17	31	185	235	
			%	0.90	7.20	13.20	78.70	100	
		N			12	108	204	924	
								1248	
同事	地理區域	北	n	23	132	131	219	505	$\chi^2 = 12.785$ $p < 0.05$
			%	4.60	26.10	25.90	43.40	100	
		中	n	8	37	45	78	168	
			%	4.80	22	26.80	46.40	100	
		南	n	13	64	74	187	338	
			%	3.80	18.90	21.90	55.30	100	
		N			44	233	250	484	
								1011	
	都市化程度	鄉	n	8	52	35	125	220	$\chi^2 = 18.198$ $p < 0.05$
			%	3.60	23.60	15.90	56.80	100	
		鎮	n	10	50	47	103	210	
			%	4.80	23.8	22.40	49	100	
		市 (含縣轄市)	n	17	90	110	176	393	
			%	4.30	21.90	28	44.80	100	
		直轄市	n	9	41	58	80	188	
			%	4.80	218	30.90	42.60	100	
		N			44	233	250	484	
								1011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5）。

表三 人際討論的密度

	%	n
沒有和任何人討論	22.84	286
和其中一種人討論	14.61	183
和其中兩種人討論	19.73	247
和其中三種人討論	27.80	348
和四種人都有討論	15.02	188
總 計	100.0	1252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5）。

再就個人政治討論網絡的密度，與地理區域或都市化程度之間的關連，透過交叉分析可以得知，表四顯示地理區域的差異，與個人政治討論網絡的密度有關，至於都市化層級則與個人政治討論網絡的密度無關。居住在中、北部的民眾，比南部的民眾，在個人政治討論網絡的密度上比較高。

至於個人政治討論網絡的一致性與否，如果區分為「我跟大家都一樣」、「我跟大家不一樣」、「大家都不一樣」，或「其它」（包括「不支持任何政黨」與「不知道討論者的立場」）這四大類。從表五中明顯的可以看出，其中政黨支持不一致的情況以朋友最多，佔近四成，且在朋友和同事這兩類中，一致與不一致的比例差兩倍以上。而在支持一致中，以家人所佔的比率最高，約有四成，但也和家人支持不一致者的比例很接近。^③

表六到表九中，本文控制受訪者的政黨認同傾向，並將其家人、鄰居、朋友、同事的政治立場與受訪者的投票選擇進行交叉分析。受限於問卷的題目與調查方式，本文僅能從受訪者自己對個人網絡中討論者政治立場的感知進行分析，將其回答歸納成「大家都一樣」、「我跟大家不一樣」、「大家都不一樣」、「不支持任何政黨」以及「不知道討論者立場」等五個變項。除了觀察人際網絡的

^③ 2007 年的選舉亦有可能延後至 2008 年初，與提前的總統選舉同時進行。一方面符合法律對兩種職務就職時間的規範，另一方面節省短期內進行兩次選舉的成本。

一致性程度外，還要探討個人網絡的討論和討論者政治態度是否會影響、改變受訪者的投票選擇。

表四 地理區域、都市化程度與個人政治討論網絡密度的交叉分析

			沒有和 任何人 討論	和其中 一種人 討論	和其中 二種人 討論	和其中 三種人 討論	和四種 人都有 討論	樣本數	檢定
地 理 區 域	北	n	129	93	125	185	95	627	$\chi^2 = 26.185$ $p = .001$
		%	20.57	14.83	19.94	29.51	15.15	100	
	中	n	32	31	43	72	35	213	
		%	15	14.55	20.18	33.80	16.43	100	
	南	n	125	59	79	91	58	412	
		%	30.33	14.32	19	22.08	14.07	100	
	N		286	183	247	348	188	1252	
都 市 化 程 度	鄉	n	82	41	52	64	41	280	$\chi^2 = 17.707$ $p = .125$
		%	29.29	14.64	18.57	22.86	14.64	100	
	鎮	n	58	41	49	76	40	264	
		%	21.97	15.53	18.56	28.79	15.15	100	
	市（含縣 轄市）	n	106	59	94	137	77	473	
		%	22.41	12.47	19.87	29	16.28	100	
	直轄市	n	40	42	52	71	30	235	
		%	17	17.87	22.13	30.21	12.77	100	
	N		286	183	247	348	188	1252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5）。

表五 人際討論網絡一致性的程度

	大家都一樣		我跟大家不一樣		大家都不一樣		不知持任何政黨	
	%	n	%	n	%	n	%	n
家人	64.7	516	7.0	56	26.5	211	1.8	14
朋友	28.2	198	6.0	42	64.6	454	1.3	9
鄰居	34.9	95	7.0	19	57.7	157	0.4	1
同事	27.5	130	5.9	28	65.7	310	0.8	4
N=1252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5）。

說 明：不知道其立場者視為遺漏值。

表六 受訪者家人的政治立場與投票傾向的交叉分析（控制受訪者的政黨認同）

受訪者的投票抉擇											
		受訪者與家人的 政治立場		泛藍		泛綠		沒有投票		樣本 數	Chi-square Sig
			n %	n %	n %	n %					
受訪者 政黨 偏好	泛 藍	大家都一樣	176	80.8	6	2.8	35	16.4	214	$\chi^2 = 7.925 \quad p = 0.441$	
		我跟大家不一樣	16	69.6	1	4.3	6	26.1	23		
		大家都不一樣	50	73.5	2	2.9	16	23.5	68		
		不支持任何政黨	1	50.0	0	0.0	1	50.0	2		
		不知道其立場	71	71.7	7	7.1	21	21.2	99		
	泛 綠	大家都一樣	6	3.4	143	81.7	26	14.9	175	$\chi^2 = 30.386 \quad p < 0.001$	
		我跟大家不一樣	1	5.9	8	47.1	8	47.1	17		
		大家都不一樣	10	15.2	37	56.1	19	28.8	66		
		不支持任何政黨	0	0.0	1	100.0	0	0.0	1		
		不知道其立場	3	3.3	64	70.3	24	26.4	91		
	中 立	大家都一樣	22	32.4	21	30.9	25	36.8	68	$\chi^2 = 9.825 \quad p = 0.278$	
		我跟大家不一樣	4	30.8	1	7.7	8	61.5	13		
		大家都不一樣	9	20.5	10	22.7	25	56.8	44		
		不支持任何政黨	3	50.0	2	33.3	1	16.7	6		
		不知道其立場	39	24.7	44	27.8	75	47.5	158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5）。

表六結果發現，傾向泛藍或泛綠的受訪者，如果家人和其政治立場一致，則超過八成的受訪者會投票給該偏好的政黨。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受訪者傾向泛藍，但大家立場都不一樣，則剩下七成三的民眾還是會投給偏好的政黨，二成四沒有投票，如果僅是受訪者與家人立場不同，則投票支持泛藍的民眾下降到不到七成，沒有投票的選民也增加為近三成，可見家人立場的不同確實造成交叉壓力而使選民降低投票參與；泛綠支持者面對大家立場都不一樣時，泛綠選民仍會支持泛綠的從八成降到五成六，選擇不去投票的為近三成，僅自己立場和大家不一樣時情況比起泛藍支持者更嚴重，選票流失更多，不到五成還會投票給泛綠陣營，沒有投票的更高達近五成，由此可見泛綠的受訪者較易受到家人政治立場的影響而改變原先的偏好支持。至於中立選民，在大家立場都一致下，投給泛藍、泛綠或不去投票的比率還算平均，有趣的是，當處於和家人政治立場不一致的環境中時，沒有投票的比率上升到五、六成，再次證實家人

對政治的立場與態度確實會造成受訪者某種程度上的壓力，處於不一致的脈絡中會使選民爲了避免起衝突或遭受排擠而不輕易表態或降低政治參與。

表七中受訪者與鄰居政治立場的比較有些因爲個案數太少，無法進行有效分析，不過交叉表分佈大致看來，跟家人相比，受訪者比較不受到鄰居政治立場影響，不管和鄰居政治立場是否一致，投票給該偏好陣營的比率均高達八、九成，沒去投票的比例也才一成左右。這可能是由於在現代社會中大多數人和鄰居較無往來，鄰居的看法與家人相比沒有那麼重要，或是不願觸碰政治話題破壞鄰里和諧，因而較少討論。要注意的是，中立者不論是處於和鄰居相同或是不同的政治立場，比較容易投給泛藍陣營的候選人，這有可能是因爲在受訪者周圍的環境中，有其他人際關係支持泛藍的民眾較多，因而受到影響。

表七 受訪者鄰居的政治立場與投票傾向的交叉分析（控制受訪者的政黨認同）

投票選擇											
		受訪者與鄰居的政治立場	泛藍		泛綠		沒去投票		樣本數	Chi-square	Sig.
受訪者政黨偏好	泛藍	大家都一樣	27	90.0%	0	0.0%	3	10.0%	30	$\chi^2 = 6.843$	$p = 0.336$
		我跟大家不一樣	9	90.0%	0	0.0%	1	10.0%	10		
		大家都不一樣	47	81.0%	3	5.2%	8	13.8%	58		
		不支持任何政黨	-	-	-	-	-	-	-		
		不知道其立場	228	74.0%	13	4.2%	67	21.8%	308		
	泛綠	大家都一樣	2	4.9%	35	85.4%	4	9.8%	41	$\chi^2 = 20.689$	$p < 0.01$
		我跟大家不一樣	1	25.0%	1	25.0%	2	50.0%	4		
		大家都不一樣	6	12.0%	40	80.0%	4	8.0%	50		
		不支持任何政黨	-	-	-	-	-	-	-		
		不知道其立場	11	4.3%	177	69.4%	67	26.3%	255		
	中立	大家都一樣	5	38.5%	4	30.8%	4	30.8%	13	$\chi^2 = 10.904$	$p = 0.207$
		我跟大家不一樣	0	0.0%	1	25.0%	3	75.0%	4		
		大家都不一樣	12	42.9%	9	32.1%	7	25.0%	28		
		不支持任何政黨	0	0.0%	0	0.0%	1	100.0%	1		
		不知道其立場	60	24.7%	64	26.3%	119	49.0%	243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5）。
說明：資料中扣除沒有與鄰居進行政治討論者。

表八中，在大家立場都一致的情形下，泛綠受訪者比起泛藍受訪者對其偏好的政黨較支持，不去投票的比率也較低，然而如果是在不一致的環境時，無論處於哪種情況，泛綠受訪者中沒有投票的比率升高，自己與朋友立場不一樣時，沒去投票的比率甚至超過三成五，然而認同泛藍的受訪者沒去投票比率卻只有 5.6%。也就是說偏好泛藍的受訪者不管與朋友立場是否一致，都對泛藍陣營有一定的高支持度，尤其在跟大家立場不一樣時反而有近九成支持度；反觀泛綠選民，跟朋友立場不一樣時，仍維持原偏好的僅有五成七，超過三成五選擇不去投票。和表四中與家人政治立場一致性結果相比，家人對受訪者投票表態與否的影響比較大，尤以泛綠受訪者的變化最為明顯。政治中立者和鄰居情況差不多，比較傾向投給泛藍候選人。

表八 受訪者朋友的政治立場與投票傾向的交叉分析（控制受訪者的政黨認同）

投票選擇												
		受訪者與朋友的政治立場		泛藍		泛綠		沒去投票		樣本數	Chi-square	Sig.
		n	%	n	%	n	%	n	%			
受訪者政黨偏好	泛藍	大家都一樣	63	75.9	3	3.6	17	20.5	83	$\chi^2 = 2.864$	$p = 0.943$	
		我跟大家不一樣	16	88.9	1	5.6	1	5.6	18			
		大家都不一樣	125	76.2	7	4.3	32	19.5	164			
		不支持任何政黨	1	100.0	0	0.0	0	0.0	1			
		不知道其立場	106	75.7	5	3.6	29	20.7	140			
	泛綠	大家都一樣	2	3.1	57	87.7	6	9.2	65	$\chi^2 = 11.764$	$p = 0.162$	
		我跟大家不一樣	1	7.1	8	57.1	5	35.7	14			
		大家都不一樣	10	6.4	111	70.7	36	22.9	157			
		不支持任何政黨	0	0.0	1	50.0	1	50.0	2			
		不知道其立場	7	6.3	76	67.9	29	25.9	112			
	中立	大家都一樣	12	40.0	6	20.0	12	40.0	30	$\chi^2 = 7.331$	$p = 0.501$	
		我跟大家不一樣	3	42.9	2	28.6	2	28.6	7			
		大家都不一樣	23	31.5	19	26.0	31	42.5	73			
		不支持任何政黨	1	20.0	1	20.0	3	60.0	5			
		不知道其立場	38	21.8	50	28.7	86	49.4	174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5）。

說 明：資料中扣除沒有與朋友進行政治討論者。

類似的結果也發生在與同事政治立場的交叉分析結果，表九中泛藍選民不論和同事立場一不一致，都有八成左右支持率，而泛綠選民處於相同脈絡中時有近九成支持泛綠陣營，但處於不一致脈絡中時，支持度就下降到六成五，沒有投票的比率也增加三倍。與家人相比，還是家人影響力較大，但與朋友相比，在面臨同事立場都不一樣的環境中時，沒去投票的比例增加，可能是因為同事見面較頻繁，因而受到的壓力影響比朋友多。

表九 受訪者同事的政治立場與投票傾向的交叉分析（控制受訪者的政黨認同）

投票選擇										
		受訪者與同事的政治立場	泛藍		泛綠		沒去投票		樣本數	Chi-square Sig.
			n	%	n	%	n	%		
受訪者政黨偏好	泛藍	大家都一樣	42	77.8	3	5.6	9	16.7	54	$\chi^2 = 3.793$ $p = 0.875$
		我跟大家不一樣	7	87.5	0	0.0	1	12.5	8	
		大家都不一樣	93	78.2	2	1.7	24	20.2	119	
		不支持任何政黨	1	100.0	0	0.0	0	0.0	1	
		不知道其立場	168	75.0	11	4.9	45	20.1	224	
	泛綠	大家都一樣	1	2.3	38	88.4	4	9.3	43	$\chi^2 = 8.871$ $p = 0.181$
		我跟大家不一樣	1	7.1	9	64.3	4	28.6	14	
		大家都不一樣	8	7.8	67	65.0	28	27.2	103	
		不支持任何政黨	0	0.0	0	0.0	0	0.0	0	
		不知道其立場	10	5.3	139	73.2	41	21.6	190	
	中立	大家都一樣	11	50.0	6	27.3	5	22.7	22	$\chi^2 = 17.932$ $p < 0.05$
		我跟大家不一樣	0	0.0	3	75.0	1	25.0	4	
		大家都不一樣	18	32.7	12	21.8	25	45.5	55	
		不支持任何政黨	0	0.0	0	0.0	3	100.0	3	
		不知道其立場	48	23.4	57	27.8	100	48.8	205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5）。

說明：資料中扣除沒有與同事進行政治討論者。

從整體交叉分析結果來看，如果受訪者政治立場有一定的傾向，且人際網絡中的討論對象和其立場一致，則愈會將選票投給支持的陣營，這合乎一般認知與研究結果。有趣以及重要的發現是，在立場不一致的情形下，選民容易選擇不去投票而非轉向其他陣營，且泛綠受訪者比起泛藍受訪者更容易選擇不去

投票，而中立選民在立場一致下的投票分佈還算平均，但在不一致的立場下也容易選擇不投票。泛藍民眾在這次 2004 年立委選舉中比較會去投票，有可能是受到總統大選敗選結果的影響，必須在立委選舉中獲勝，取得多數席次，以制衡泛綠的執政黨，而泛綠傾向的受訪者容易受到人際網絡因素的影響，在政治立場、態度不一致時，較傾向選擇不去投票，這或許與泛綠陣營在施政上的表現不佳，加上選民受到人際網絡中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影響，最後乾脆選擇不去投票有關。^④

陸、個人政治討論網絡、社會脈絡與投票抉擇

國內有關選民投票行為的解釋，主要仍依循社會心理學或理性選擇的研究途徑，著重選民的政黨認同、候選人的評價，以及統獨議題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例如徐火炎（1991, 2001, 2004）研究結果，發現選民對政黨的心理傾向，包括政黨印象與偏好等，對黨派投票抉擇具有直接且顯著影響。臺灣選民已具備政黨認同心理傾向，但是這種態度上的差異之根源，仍須考慮家庭與社會背景的不同，以及其他因素，例如省籍、族群認同、統獨議題立場的影響。吳乃德（1992）認為政黨認同是投票行為最重要的變數之一，同時也影響政黨勢力的消長和版圖分佈。作者認為過去臺灣選民政黨認同主要的基礎是意識型態的分歧，包括民主理念、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但目前則有很大的變化。雖然上一代選民的政黨認同持續以意識型態為主要基礎，可是新世代的政黨認同卻和意識型態無關，新世代選民政黨認同的最重要基礎是家庭社會化的結果，繼承了父親對特定政黨的認同。劉義周（1994）、陳陸輝（2000）則利用跨時性的資料檢視臺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發現省籍、統獨立場與臺灣人

④ 審稿人之一建議本文應該進一步分析，受到交叉壓力而不去投票的泛綠支持者，是否對政府的施政表現呈現不滿。本文仔細查對 TEDS 2004L 的 B 卷（劉義周，2005）中，發現此次調查並未詢問受訪者對政府施政的滿意度，因此無法再進一步分析。

或中國人的認定都是影響政黨認同的因素之一，但是政治世代相當程度影響選民政黨認同與族群認同，不同世代的選民影響其政黨認同的原因也不同，尤其年輕選民在政治信任感與滿意度上也會左右政黨認同，因此其認同有可能隨之改變。

此外，由於臺灣歷史的特殊性，省籍或族群與統獨也常被當成一種容易造成選票動員的議題，是各候選人勝選最後的神主牌，也一直是研究臺灣選舉行為分析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國內研究省籍情結與統獨議題的學者眾多，普遍認同該二者對於選民政黨認同的形成與投票抉擇具顯著影響，且無疑是 1990 年代最值得注意的政治議題，並有持續發展的空間（盛杏媛，2002:63）。然而也有部份學者認為改革與安定的議題有取代省籍與統獨的趨勢，成為新的社會分歧線，而未來可能有更多的新議題在臺灣政治版圖佔有一席之地（盛治仁，2000）。

在候選人因素上，國內的研究發現雖然政黨認同仍對投票抉擇具相當決定性，可是候選人整體形象仍有決定性影響（梁世武，1994；黃秀端，1996；徐火炎，1996；傅明穎，1998）。尤其是競爭激烈的總統選舉，由於候選人容易在媒體上曝光，加上採取單一選區相對多數的選舉制度，候選人因素成為勝出的關鍵。除此之外，黃秀端（2005）、鄭夙芬等（2005）還提出候選人整體形象與感情溫度計有密切相關，感情溫度計的測量也與投票行為有顯著影響。以上研究可知政黨認同、統獨議題，以及候選人因素都會影響臺灣選民的投票選擇。^⑤ 然而，個人的政治討論網絡以及社會脈絡，是否會影響 2004 年立委選舉選民的投票抉擇呢？

透過洛基迴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的分析，表十顯示，在控制政治版圖變項之後，年齡、教育程度、政黨偏好與統獨立場還是對選民的投票選擇具

^⑤ 由於立法委員選舉的調查資料，缺乏針對每一個立委候選人的問政表現之評估，因此無法分析將候選人的評價納入模型分析中。

表十 政黨偏好、統獨立場與投票抉擇的洛基迴歸模型分析（控制政治版圖）

	投票選擇（泛藍=1）（泛綠=0）					
	政治版圖 （藍 60% 以上）		政治版圖 （藍 50%-59%）		政治版圖 （藍 49% 以下）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性別（參照女性）	-0.45	0.45	0.06	0.45	-0.32	0.61
年齡（參照 1945 年以前出生）						
1945~1970 年出生	-1.46	0.7 **	0.13	0.61	-0.22	0.84
1971 年後出生者	-0.61	0.88	-0.21	0.74	-0.86	1.11
教育程度（參照國中以下）						
高中與大專	-0.09	0.6	1.05	0.53 **	0.09	0.73
大學以上	0.19	0.67	1	0.66	0.55	1.02
省籍（參照閩南人）						
外省人	-0.41	0.59	0.51	0.73	0.52	0.81
客家人	0.28	0.76	-0.33	0.72	0.12	1.61
政黨偏好（參照無政黨偏好）						
偏向泛藍	2.58	0.55 ***	3.1	0.58 ***	3.41	0.73 ***
偏向泛綠	-2.78	0.53 ***	-1.67	0.53 **	-3.05	0.75 ***
統獨立場（參照維持現狀）						
傾向統一	0.9	0.6	-0.04	0.6	2.09	0.87 **
傾向獨立	-2.12	0.6 ***	-0.83	0.59	-0.86	0.9
常數項	2	0.71 **	-0.91	0.68	-0.03	0.87
N=	284		239		192	
LR chi ² =	229.83		182.3		173.78	
Prob > chi ² =	.00		.00		.00	
Log Likelihood=	-75.12		-73.9		-45.68	
Pseudo R ² =	0.6		0.55		0.66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5）。
 說 明：*：< 0.05，**：< 0.01，***：< 0.001。

有影響力，並以政黨偏好為最，而性別或省籍則沒有太大的影響。在年齡上，中世代選民處於較支持泛藍的地區當中，對投票行為較具解釋力，也愈易投給泛綠陣營。教育程度高者比起教育程度低者，在競爭激烈的地區傾向投給泛藍陣營（β=1.05）。在政黨偏好部分，無論處於哪一種政治版圖當中都具有顯著

性，有趣的是，和無政黨偏好者相較，泛藍的選民愈處於泛綠環境當中，愈易投票給泛藍陣營，而泛綠選民則是處於相同環境脈絡下，愈易支持泛綠候選人。統獨立場則在藍綠壁壘分明的地區有較高解釋力，比無特定統獨立場者，傾向獨立的選民，愈處於支持泛藍的環境脈絡下，愈會投票給泛綠，同樣的，傾向統一的選民愈處於支持泛綠的環境中，愈會選擇泛藍候選人。以上結果可以看出，處於不同環境脈絡下的少數者，反而會積極尋找立場相近的人形成保護團體，並且更加團結的表達支持。

表十一控制受訪者所在的地理區域，並將地理區域歸併為北、中、南三大區塊，探討各自變項對投票選擇的影響。^⑥除了性別與省籍之外，其他變項或多或少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其中還是以政黨偏好的解釋力最高。年齡部分，處於北部的年輕世代比中世代還要傾向投給泛綠，但在中部地區則傾向投給泛藍陣營。在教育程度方面，教育程度較高者對於投票選擇很明顯與居住所在地有關，住在北部地區的知識份子傾向投票給泛藍候選人，而中部地區則傾向投給泛綠候選人。而政黨傾向偏好泛藍的選民，無論處於哪一地區，仍然選擇投票給泛藍，其中以北部地區選民的解釋力最高（ $\beta=3.24$ ），同樣的泛綠支持者也是一樣的情形，然而以中部地區的解釋力最高（ $\beta=-3.53$ ），南部地區的選民反而解釋力較低。具有統獨立場的選民無論居住何地，傾向統一者較支持泛藍，傾向獨立者較支持泛綠，其中也是以中部地區的選民解釋力最高。

表十二顯示影響選民決定去不去投票的因素上，在還沒有加入其它因素（選民的經社背景、政黨認同與統獨立場等）之前，先看個人政治討論的網絡與社會脈絡，對選民投不投票的影響。模型一顯示，個人政治討論網絡對投不投票的影響力，要高於社會脈絡（包括地理區域、政治版圖與都市化程度）

^⑥ 本文認為席次減半後之單一選區比舊制難買票，但是作者分別在藍、綠政黨場合演講此題目時，在場政治人物多認為選區地理範圍縮小後，買票會更容易且氾濫。實際狀況如何，恐需等到實施之後的實證分析驗證。

表十一 政黨偏好、統獨立場與投票抉擇的洛基迴歸模型分析（控制地理區域）

	投票選擇（泛藍=1）（泛綠=0）					
	北部		中部		南部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性別（參照女性）	-0.36	0.41	-1.32	0.82	0.08	0.44
年齡（參照 1945 年以前出生）						
1945~1970 年出生	-1.03	0.57	-0.44	1.29	-0.44	0.63
1971 年後出生者	-1.6	0.72 *	1.47	1.56	-0.81	0.79
教育程度（參照國中以下）						
高中與大專	1.68	0.57 **	-1.65	1.06	0.02	0.52
大學以上	1.94	0.64 **	-1.97	1.27	0.37	0.69
省籍（參照閩南人）						
外省人	-0.04	0.54	-0.33	0.9	0.77	1.06
客家人	0.19	0.69	-0.21	1.59	-0.35	0.78
政黨偏好（參照無政黨偏好）						
偏向泛藍	3.24	0.51 ***	2.49	1.06 **	2.84	0.59 ***
偏向泛綠	-2.69	0.5 ***	-3.53	0.91 ***	-2.03	0.53 ***
統獨立場（參照維持現狀）						
傾向統一	0.22	0.57	1.09	0.92	0.62	0.67
傾向獨立	-1.81	0.55 **	-2.43	1.4	-0.75	0.63
常數項	-0.29	0.56	2.87	1.43 *	0.09	0.66
N=	369		121		225	
LR chi ² =	330.54		106.76		158.96	
Prob > chi ² =	0.00		0.00		0.00	
Log Likelihood=	-86.97		-27.89		-76.21	
Pseudo R ² =	0.66		0.66		0.51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5）。

說 明：*：< 0.05，**：< 0.01，***：< 0.001。

的影響力。^⑦ 其中家人一致傾藍，或是家人一致傾綠的受訪者，最後選擇去投票的機率，要遠高於那些家人的立場混亂，或是不知道家人立場的受訪者。其

⑦ 受限於分析個案數太少的關係，本文在洛基迴歸模型的分析中，將個人的政治討論網絡，歸類為四項：家人一致偏藍、一致偏綠、立場混亂與不知道其立場等四類。至於朋友、鄰居與同事的政治立場，在前面的交叉分析中顯示沒有比家庭成員因素來得重要，因此決定不納入模型的分析中。

表十二 個人政治討論網絡、社會脈絡與投票抉擇的洛基迴歸模型分析

依變項 解釋變項	投票參與（有 =1）（無 =0）				投票選擇（泛藍 =1）（泛綠 =0）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性別（參照女性）	-	-	.27	.17	-	-	-.40	.30
年齡（參照 1945 年以前出生）								
1945~1970 年出生	-	-	-.40	.30	-	-	-.71	.43
1971 年後出生者	-	-	-1.30	.33***	-	-	-.62	.53
教育程度（參照國中以下）								
高中與大專	-	-	-.44	.23	-	-	.39	.38
大學以上	-	-	-.44	.27	-	-	.20	.47
省籍（參照閩南人）								
外省人	-	-	-.21	.24	-	-	.25	.49
客家人	-	-	-.50	.28	-	-	-.29	.53
政黨偏好（參照無政黨偏好）								
偏向泛藍	-	-	.68	.25**	-	-	2.56	.44***
偏向泛綠	-	-	.31	.24	-	-	-2.39	.42***
統獨立場（參照維持現狀）								
傾向統一	-	-	.21	.23	-	-	.49	.39
傾向獨立	-	-	.10	.23	-	-	-1.28	.41**
家人政黨偏好（參照泛綠）								
偏向泛藍	-.10	.26	-.34	.33	4.39	.37***	1.07	.62
混亂	-.86	.25**	-.91	.29**	2.23	.30***	1.19	.52*
不支持任何政黨	-.64	.23**	-.82	.28**	1.83	.27***	.42	.52
地理區域（參照中部地區）								
北部地區	-.26	.24	-.32	.27	.19	.32	-.47	.55
南部地區	-.22	.29	-.32	.32	.29	.37	-.43	.63
政治版圖 （參照泛藍得票率 50%-59%）								
泛藍得票率 60% 以上	-.07	.20	-.11	.21	.24	.25	.30	.38
泛藍得票率不到 50%	-.21	.18	-.19	.21	.10	.22	-.13	.36
都市化程度（參照鄉）								
鎮	-.59	.27*	-.66	.30*	.56	.36	.29	.58
市（包含縣直轄市）	-.23	.21	-.22	.24	.07	.26	.10	.41
直轄市	-.03	.25	.09	.28	.31	.29	.21	.46
常數項	2.28	.35***	2.99	.52***	-2.37	.45***	.41	.95
N=	1117		1013		697		660	
LR χ^2 =	25.18		94.84		262.85		571.48	
Prob > χ^2 =	0.004		<0.001		<0.001		<0.001	
Log Likelihood=	-568.3009		-477.5174		-350.1103		-169.5274	
Pseudo R ² =	0.0222		0.0903		0.2729		0.6276	

資料來源：劉義周（2005）。

說 明：*：< 0.05，**：< 0.01，***：< 0.001。

次，如果加入其它變項，模型二顯示家庭的政治討論網絡，它的解釋力仍然存在。其它比較重要的因素，還有年齡及個人的政黨認同，這些因素共同影響選民投不投票的決定。年紀越大、傾向泛藍認同的選民，以及家人的立場一致偏藍或偏綠，都會加深選民最後選擇去投票；而年紀越輕、無政黨傾向的選民，以及家人的立場不明確，都會降低選民最後選擇去投票的意願。

至於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因素，在還沒有加入其它因素（選民的經社背景、政黨認同與統獨立場等）之前，先看個人政治討論網絡與社會脈絡，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模型一顯示，個人政治討論網絡的影響力，同樣高於社會脈絡（包括地理區域、政治版圖與都市化程度）的影響力。其中家人立場一致偏向泛藍，受訪者最後投給泛藍的比率最高，而家人立場一致偏向泛綠，受訪者最後投給泛藍的比率最低。然而，如果加入其它變項，模型二顯示家庭的政治討論網絡，其解釋力就不見了，表十二中可以看出受訪者的政黨認同以及統獨立場，才是影響選民投票抉擇最重要的因素，傾向泛藍認同的選民，受訪者最後投給泛藍的比率最高；傾向泛綠認同與主張臺灣獨立的選民，受訪者最後投給泛藍的比率最低。至於家人的政治立場因素，則被個人政黨認同的因素所吸收了。

柒、結論

政治參與一直是政治學領域研究中相當重要且受到重視的課題，不僅是因為可以反映民意所向，民眾參與政治的行為，更可以視為對政治體系，甚至對政府支持與否的表現，而其中又以選舉投票行為為最普遍、直接的表達方式，也是最具合法性與正當性。關於投票行為主流的研究，往往著眼於影響選民投票的因素為個人因素，也就是多從選民本身的角度出發，探討其主觀的心理影響。然而，自 1980 年代以來，開始有學者重新肯定社會學研究途徑強調社會環境中的社會互動對個人行為的影響。因此，本文依循該研究途徑，分析影響

2004年立委選舉選民投票抉擇的原因，希望能在臺灣社會中搜尋出具社會關係投票取向的選民。

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在控制選民政黨認同的條件下，認同泛藍陣營的選民，如個人與家庭其他人的政治立場不一樣，比起和那些家庭內成員的政治立場一樣，或是家庭內成員的政治立場都不一樣的人，最後把票投給泛藍陣營的比率最低（69.6%）。在家庭成員的壓力下，他們也沒把票投給泛綠陣營，而是有部份的人選擇不去投票（26.1%）。認同泛綠陣營的選民，如個人與家庭其他人的政治立場不一致，比起那些和家庭內成員的政治立場一致，或是家庭內成員的政治立場都不一致的人，最後把票投給泛綠陣營的比率也是最低（47.1%）。在家庭成員的壓力下，他們也沒把票投給泛藍陣營，而是有高達47.1%的人選擇不去投票。由此資料顯示家人的政治討論與政治立場，明顯影響到個人的投票抉擇，但影響的方向是決定要不要去投票，而不是其投票對象。至於鄰居、朋友或同事等人際網絡因素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則沒有家庭因素來得明顯。

其次，本文進一步分析社會網絡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透過 Logistic 迴歸模型的分析，在控制政治版圖的因素下，政黨認同仍是影響選民投票抉擇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統獨立場；而年齡在泛藍陣營得票絕對優勢（得票率超過60%以上）的村里，如選民的年紀越大，越傾向投給泛藍陣營。有趣的發現是，不管是泛藍或泛綠的認同者，如果居住在其投票支持陣營較弱勢的地區，最後投給其所認同陣營的比率，要高於同樣認同其陣營，但居住在其陣營得票率較高的村里。這顯示居住在其所認同陣營較弱勢的村里，反而較具有凝聚選票的效果，這個發現與美國的研究結果很類似。

在控制地理區域下，政黨認同仍是影響選民投票抉擇最重要的因素；居住在北部的選民，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泛藍陣營；年紀越低，越支持泛綠陣營。然而，居住地理區域的差異，並沒有明顯升高或降低政黨認同、統獨立場等因素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這顯示臺灣民眾對政黨的忠貞程度，並沒有出

現南北的差異。

最後，本文有二個研究限制，第一是在測量個人政治討論網絡時，受限於調查訪問方法不同於國外使用滾雪球的調查方式，以致於無法正確得知受訪者知覺其討論對象真正的政治立場，以作為推論的依據；第二個研究限制是，關於選民居住的區域，雖然以村里作為基本的分析單位，但臺灣缺乏以村里為單位的總體資料，作為結合總體分析與個體分析的依據，本文僅能以各村里的投開票資料，以及大範圍的地理區域，作為統計推論的依據。

參考書目

- 吳乃德（1992）。〈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臺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74期，頁33-60。
- 吳重禮、譚寅寅、李世宏（2003）。〈賦權理論與選民投票行為：以2001年縣市長與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為例〉，《臺灣政治學刊》，第7卷，第1期，頁91-156。
- 洪永泰（2000）。〈政治版圖重整：2000年總統選舉的選後評估〉，「2000年選舉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10月21-22日。
- 孫秀蕙（1995）。〈比較臺灣省選民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使用對政治行為的影響：以民國83年臺灣省長選舉為例〉，《選舉研究》，第2卷，第1期，頁99-118。
- （1996）。〈選民的傳播型態對政治行為的影響：以1996年總統大選為例〉，《選舉研究》，第3卷，第2期，頁71-106。
- 徐永明（2000）。〈「南方政治」的形成？臺灣政黨支持的地域差別，1994-2000〉，《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2卷，第4期，頁167-96。
- （2001）。〈政治版圖：兩個選舉行為研究途徑的對話〉，《中國地方自治》，第51卷，第11期，頁4-24。
- 徐火炎（1991）。〈政黨認同與投票選擇：臺灣地區選民對政黨印象、偏好與黨派投票行為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4卷，第1期，頁1-57。
- （1996）。〈臺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1991-1993年的實證研究結果〉，《臺灣政治學刊》，創刊號，頁85-127。
- （2001）。〈1998年二屆臺北市長選舉選民投票行為之分析：選民的黨派抉擇與分裂投票〉，《東吳政治學報》，第13期，頁77-127。
- （2004）。〈臺灣結、中國結與臺灣心、中國情：臺灣選舉中的符號政治〉，《選舉研究》，第11卷，第2期，頁1-41。
- 郭及天、王嵩音（2001）。〈總統參選人夫人媒介形象呈現之初探：以連方瑀、吳淑珍、陳萬水為例〉，《選舉研究》，第8卷，第2期，頁65-94。
- 盛治仁（2000）。〈統獨不再對決：從2000年選舉看臺灣新社會分歧的興起及影響〉，《理論與政策》，第14卷，第2期，頁119-39。
- 盛杏媛（2002）。〈統獨議題與臺灣選民的投票行為：1990年代的分析〉，《選舉研究》，第9卷，第1期，頁41-75。
- 張卿卿（2002）。〈競選媒體使用對選民競選議題知識與政治效能感的影響：以兩千年總統大選為例〉，《選舉研究》，第9卷，第2期，頁1-36。
- 翁秀琪、孫秀蕙（1994）。〈選民媒介使用行為及其政治知識、政黨偏好與投票行為之間的關連：兼論臺灣媒體壟斷對政治認知與行為的影響〉，《選舉研究》，第2卷，第1期，頁1-25。
- 陳文俊（1995）。〈統獨議題與選民的投票行為：民國83年省市長選舉之分析〉，《選舉研究》，第2卷，第2期，頁99-136。
- 陳陸輝（2000）。〈臺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第7卷，第2期，頁

- 109-41。
- 梁世武 (1994)。〈1994 年臺北市長選舉之預測：「候選人形象指標」預測模式之驗證〉，《選舉研究》，第 1 卷，第 2 期，頁 97-129。
- 傅明穎 (1998)。〈北市選民的候選人評價與投票決定〉，《臺灣政治學刊》，第 3 期，頁 195-243。
- 彭芸 (2001)。〈兩千年總統大選的媒介使用、選舉參與與投票對象〉，《選舉研究》，第 7 卷，第 1 期，頁 21-52。
- (2002)。〈2001 年臺灣選民的媒介行為與政治信任〉，《選舉研究》，第 9 卷，第 2 期，頁 1-36。
- 黃秀端 (1995)。〈1994 年省市長選舉選民參與競選活動之分析〉，《選舉研究》，第 2 卷，第 1 期，頁 51-76。
- (1996)。〈決定勝負的關鍵：候選人特質與能力在總統選舉中的重要性〉，《選舉研究》，第 3 卷，第 1 期，頁 103-35。
- (2005)。〈候選人形象、候選人情感溫度計、與總統選民投票行為〉，《臺灣民主季刊》，第 2 卷，第 4 期，頁 1-30。
- 蔡明惠 (2004)。〈澎湖馬公地區外省籍榮民投票取向知探析〉，《臺灣民主季刊》，第 1 卷，第 4 期，頁 139-60。
- 蔡勇美、郭文雄 (1984)。《都市社會學》。臺北：巨流。
- 劉義周 (1994)。〈臺灣政黨形象的世代差異〉，《選舉研究》，第 1 卷，第 1 期，頁 53-73。
- (2005)。《2002 年至 2004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計畫：民國 93 年立法委員選舉大型面訪案 (IV)》，NSC 93-2420-H-004-005-SSS。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鄭夙芬、陳陸輝、劉嘉薇 (2005)。〈2004 年總統選舉中的候選人因素〉，《臺灣民主季刊》，第 2 卷，第 2 期，頁 31-70。
- Bartels, Larry M. (1988). *Presidential Primaries and the Dynamics of Public Cho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ck, Paul Allem, Ruessell J. Dalton, Steven Freene, and Robert Huckfeldt (2002). "The Social Calculus of Voting: Interpersonal, Media, and Organization Influences on Presidenti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6, No. 1:57-73.
- Berelson, Bernard, Paul F. Lazarsfeld, and William N. Mcphee (1954).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rger, Josef (1960). *Discoverers of the New World*. New York: American Heritage.
- Berry, William D., Michael S. Lewis-Beck (1986). *New Tools for Social Scientists: Advances and Applications in Research Method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 Curtice, John (2002). "The State of Election Studies: Mid-life Crisis or New Youth?" *Electoral Studies*, Vol. 21, No. 2:161-68.
- Erikson, R. S. (2002).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and Macro Analysis." *Electoral Studies*, Vol. 21,

- No. 2:269-81.
- Finifter, Ada W. (1974). "The Friendship Group as a Protective Environment for Political Devian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8, No. 2:607-25.
- Flanagan, Scott C. (1991). *The Japanese Vo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Johnston, Richard, and Henry E. Brady (2002). "The Rolling Cross-section Design." *Electoral Studies*, Vol. 21, No. 2:283-95.
- Johnston, M., W. Philips Shively, and R. V. Stein (2002). "Contextual Data and the Study of Elections and Voting Behavior: Connecting Individuals to Environments." *Electoral Studies*, Vol. 21, No. 2:219-33.
- Huckfeldt, Robert, Eric Plutzer, and John Sprague (1993). "Alternative Contexts of Political Behavior: Churches, Neighborhoods, and Individual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5, No. 2:365-81.
- Huckfeldt, Robert, and John Sprague (1987). "Network in Context: The Social Flow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1, No. 4:1197-1216.
- Huckfeldt, Robert, Jeffery Levine, William Morgan, and John Sprague (1998). "Election Campaigns,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Accessibility of Perceived Discussant Preference." *Political Behavior*, Vol. 20, No. 4:263-94.
- Huckfeldt, Robert, Paul Allem Beck, Ruessell J. Dalton, Jeffery Levine, and William Morgan (1998). "Ambiguity, Distorted Message, and Nested Environment Effects 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0, No. 4:996-1030.
- Key, V.O., Jr., and F. Munger (1959). "Social Determinism and Electoral Decision: The Case of Indiana," In Eugene Burdick and Arthur J. Brodbeck (eds.), *American Voting Behavior* (pp. 281-99). Glencoe, IL: Free Press.
- Lazarsfeld, Paul F.,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1968). *The People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rsh, M. (2002). "Electoral Context." *Electoral Studies*, Vol. 21, No. 2:207-17.
- McPhee, William (1963). "A Theory of Informal Social Influence." In William McPhee (ed.), *Formal Theories of Mass Behavior* (pp. 74-103).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 Mutz, Diana (2002). "The Consequences of Cross-Cutting Network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6, No. 4:838-55.
- Monroe, Alan D. (1975).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 Popkin, Samuel L. (1991). *The Reasoning Vo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rahl, Ralph (1988). "Social Network and Collective Action: A Theory of the Critical Mass. II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4, No. 3:502-34.
- Rahn, Wendy M., John H. Aldrich, and Eugene Borgida (1994). "Individual and Cotextual Variation in Political Candidate Appraisa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1:193-99.
- Shanon, Benny (1990). "What is Context?" *Journal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Vol. 20, No. 2:157-66.

- Stoker, Laura, and Jake Bowers (2002). "Designing Multi-level Studies: Sampling Voters and Electoral Contexts." *Electoral Studies*, Vol. 21, No. 2: 235-67.
- Westlye, Mark C. (1991). *Senate Elections and Campaign Intens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ocial Context, Individual Network on Vote Choice: A Study of the 2004 Legislative Elections in Taiwan

Yu-tzung Chang and Peiru Chau

Abstract

Using a sociological research approach, we find that, controlling for party identification, those identifying with the pan-blue camp whose political position differed from those of all their family members voted for the pan-blue camp less (69.6%) than either those whose position was the same as all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or those whose position agreed with those of some family members but not with others. Under pressure from their families, many of these voters did not necessarily vote for the pan-green camp, but instead decided not to vote (26.1%). Likewise, those identifying with the pan-green camp whose political position differed from those of all their family members also voted for the pan-green camp less (47.1%) than either those whose position was the same as all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or those whose position agreed with those of some family members but not others. A high percentage of these voters (47.1%) also decided not to vote, under pressure from their families.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find that party-identificatio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voter choice, and independence/unification position was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Interestingly, regardless of whether identifying with the pan-blue or pan-green camp, voters living in districts in which support for their camp is weak tend to vote for their own camp more often than those living in districts in which support for their camp is strong.

Keywords: social context, individual network, vote choice, the 2004 legislative elections in Taiwan.

Yu-tzung Chang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 current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 election studies,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Peiru Chau is a graduate stud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election studies.